

# 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企业家群体与英国工业化时期贸易政策的转型

尹建龙

**【摘要】**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叶的近百年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启动、发展和工业霸权的确立,英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实现了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的转变。新兴工业企业家群体出于维护自身利益、防止爱尔兰竞争的实用主义目的,联合起来反对符合自由贸易原则的1785年《大不列颠王国和爱尔兰王国通商条约草案》。他们为开拓法国市场,又以自由贸易为借口,支持1786年《英法商约》,并不惜与传统制造业决裂。1830年代英国工业化优势牢固确立后,以自由贸易的名义占领广阔的世界市场则成为企业家群体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支持并领导了反《谷物法》运动,推动确定了自由贸易政策。英国企业家群体并不是自由贸易的天然拥护者,实用主义和自身利益决定了其对不同贸易政策的灵活立场。

**【关键词】**工业化;企业家群体;自由贸易;《谷物法》

**【作者简介】**尹建龙,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安徽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欧洲经济社会史(安徽 合肥 230039)。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22.5.134~14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SS02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YJCGJW008);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dZD2019001)。

1776年,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首次出版,系统提出了自由贸易经济理论。在此之前的1771年,英国企业家理查德·阿克赖特在诺丁汉创办了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工厂(水力纺纱厂),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自由贸易理论的提出与英国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在时间上的高度重合,给后世研究者正确认识两者间的关系设置了许多障碍,形成了一些不尽符合史实的看法。例如,一部21世纪初制作完成的纪录片在谈到英国工业化发展时说:“斯密-李嘉图的‘自由经济理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是英国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国走上了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使英国顺利完成了工业化,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sup>①</sup>这种观点忽略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后逻辑顺序,也忽视了英国工

业革命的自发性特征。

虽然学术界关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结束的具体时间还有争论,但普遍认为其时间跨度是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上半叶。<sup>②</sup>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完成的标志性事件是1851年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英国贸易政策也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的转变。王觉非主编的《近代英国史》认为,这种转变完成的标志是1846年废除《谷物法》,“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英国全面放弃保护关税政策”,是“自由贸易政策胜利的产物”。<sup>③</sup>钱乘旦在《英国通史》中认为,英国在1846年废除《谷物法》和1849年废除《航海条例》表明,“自由贸易的原则终于胜利了……自由贸易的原则被彻底认可”,英国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期。<sup>④</sup>

强调贸易保护的重商主义为英国率先开启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但不断发展的工业化扩大了英国对世界市场的需求,推动其逐步转向自由贸易。亲眼见证这一转变过程的马克思和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此有精彩的评论。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讲》中指出,“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sup>⑤</sup>。李斯特则用幽默的文笔讽刺英国自由贸易理论在欧洲的传播:“任何国家,如果靠了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与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发展,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sup>⑥</sup>

国内外学术界对工业化时期英国贸易政策转型的研究关注较多。研究英国工业化转型的西方学者如哈罗德·珀金、彼得·马西厄斯、阿萨·勃里格斯等,对英国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政策转型的历史过程、社会影响等进行了精辟的分析。<sup>⑦</sup>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则重点关注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对西欧各国贸易政策转型的影响。<sup>⑧</sup>国内学术界关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贸易政策变化的研究以宏观论述居多,侧重于介绍英国贸易政策转变的整个历程。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张云宜《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的自由贸易运动》(《史学月刊》1984年第4期)、李新宽《论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阶段性演进》(《世界历史》2008年第5期)、吴必康《变革与稳定:英国经济政策的四次重大变革》(《江海学刊》2014年第1期)等论文。梅俊杰比较分析了重商主义对英国与贸易保护政策对美国顺利实现工业化的积极影响,批判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将自由贸易塑造为工业化必要条件的“神话”和谎言。<sup>⑨</sup>

英国1815年通过的《谷物法》是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的典型代表,1846年废除《谷物法》标志着其全面转向自由贸易。国内学界围绕《谷物法》存废问题,

关注重要政治人物如小罗伯特·皮尔首相、新兴工业企业家的代表人物理查德·科贝登等人在推动自由贸易政策转变中的作用。辜燮高先生综述介绍了英国学术界对废除《谷物法》的政治博弈、经济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sup>⑩</sup>张云宜《评1846年英国谷物法的废除》(《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张本英《罗伯特·皮尔与〈谷物法〉的废除》(《学海》2003年第5期),黄少安、郭艳茹《对英国谷物法变革(1815-1846)的重新解释及对现实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刘成《英国废除〈谷物法〉刍议》(《史学集刊》2013年第1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解读英国废除《谷物法》与确立自由贸易政策之间的关系。

关于英国工业革命、重商主义、自由贸易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符合历史事实的表述应该是:长期的重商主义贸易保护政策推动英国率先开始工业化进程,获得了远超其他国家的先发性工业优势、贸易优势;要维持并扩大这种先发优势,自由贸易作为一个政策选项要远胜贸易保护主义,因此英国在理论上将自由贸易学说推上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在实践上采纳了自由贸易政策。从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发轫到19世纪中期确立工业霸权,英国贸易政策变化的总体趋势是逐步放松贸易管制,逐步实现贸易自由,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过渡。以拿破仑战争为界,英国企业家群体关于贸易政策的主张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拿破仑战争之前,企业家群体受重商主义的影响更大,总体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这体现在他们反对《大不列颠王国和爱尔兰王国通商条约草案》(以下简称《英爱条约》)和对待《英法商约》的复杂态度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企业家群体总体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以曼彻斯特棉纺织业工厂主为首的企业家群体领导了“反谷物法同盟”,并最终废除《谷物法》,推动英国全面拥抱自由贸易。

### 一、企业家群体抵制1785年《英爱商约》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往往刻意强调企业家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必然联系,但经济史的研究则往往证明企业家群体并不是“自由贸易”的天然支持者。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家群体根据自身利益需

求的变化,调整对贸易政策的立场,体现出实用主义的特点。在1785年围绕《英爱商约》开展的博弈中,为了保证对大英帝国内部市场的垄断,遏制爱尔兰工业发展,消除潜在竞争对手,英国企业家群体坚决反对给予爱尔兰有限的自由贸易权利,受到亚当·斯密的严厉批评。

17世纪中期以来,英国长期奉行以《航海条例》为代表的重商主义政策,保护国内和殖民地市场,为工业化的启动创造了条件。沃尔波尔在担任英国首相期间(1721-1741年)采取了鼓励进口工业原材料、禁止进口与本国产品存在竞争关系的外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政策<sup>①</sup>。特别是为了打击印度的棉纺织业,在1736年以法律形式严禁英国人及居住在英国的外国人买卖、穿着或拥有进口印花棉布,违反者重罚,但同时允许进口棉花,鼓励本土棉纺织业发展,<sup>②</sup>直接推动了英国棉纺织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奠定了英国工业革命首先在棉纺织业开始的基础。

但重商主义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英国对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奉行的重商主义政策被认为是导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的“罪魁祸首”。受美国独立的政治影响和战争对爱尔兰出口经济的冲击(当时爱尔兰的经济支柱——亚麻纺织业的主要出口市场是北美,受战争影响锐减),同样饱受英国重商主义束缚的爱尔兰经济恶化、民心不稳。<sup>③</sup>为避免“后院失火”,正陷于北美战争泥潭的英国政府于1778年4月向议会建议,解除爱尔兰向英国本土和各殖民地出口商品的限制性禁令,在英国殖民地市场赋予爱尔兰企业与英国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这个建议激起了英国工商企业家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从殖民地进口亚麻和生铁的布里斯托尔商人最为坚决,他们联合各地炼铁厂主们向议会请愿,迫使英国政府放弃该提议。<sup>④</sup>

1783年1月,英国议会正式承认了爱尔兰议会的独立立法权(法案通过后需经英国国王签署)<sup>⑤</sup>,这使爱尔兰议会在调整两国贸易关系、争取自由贸易方面更加积极主动。12月出任英国首相的小威廉·皮特<sup>⑥</sup>一方面汲取了美国独立的教训,主张放松对爱

尔兰贸易的管制,另一方面对英爱关系也不满意,认为“没有规定帝国的全面控制权,甚至没有解决爱尔兰在帝国内部的贸易权问题”<sup>⑦</sup>。1785年初,爱尔兰议会建议调整英国对爱尔兰的贸易政策,降低两国之间的进出口关税。该建议得到了小威廉·皮特首相的支持,并进而提出消除爱尔兰向英国本土出口商品的各种限制、向爱尔兰全面开放殖民地贸易、两国关税税率趋同、建立互惠制度、爱尔兰将部分增加的财政税收上缴英国财政部的一揽子计划。这就是1785年的《英爱商约》。

小威廉·皮特首相的爱尔兰政策是符合自由贸易原则且富有远见的,对于缓和英爱矛盾、促进爱尔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为了照顾英国地主和农业部门的利益,《英爱商约》中规定两国间的农产品以及羊毛、漂白土等工业原材料的贸易不享受互惠待遇。同时,虽然规定两国不能对出口商品提供补贴,但农产品如谷物、肉类、燕麦、面粉、饼干等除外。因此,受《英爱商约》影响最大的是英国新兴的棉纺织业、钢铁业、陶瓷业、金属加工业。<sup>⑧</sup>这些行业的企业家们早就对小威廉·皮特首相为了弥补北美独立战争的军费亏空而大肆提高国产税税率、开征新税的做法极为不满<sup>⑨</sup>,《英爱商约》犹如火上浇油,促使英国各行业企业家为反抗小威廉·皮特的“暴政”而团结起来。

1785年1月,曼彻斯特棉纺厂主托马斯·沃克和另外一位棉纺厂主应邀参加了英国议会贸易和国外种植园委员会(Committee on Trade and Foreign Plantations)举行的关于英国与爱尔兰关系的听证会,并回答了议员的问题。但该委员会并未告知沃克等人该听证会的目的,导致沃克等人以为听证会是在讨论“棉布税”问题。小威廉·皮特政府在会后又对沃克等人的发言断章取义,将其作为英国棉纺织业支持《英爱商约》的证据予以大肆宣扬,污蔑英国棉纺织业企业家自私自利、反复无常,顽固维护行业利益,缺乏爱国情怀。曼彻斯特棉纺织业企业家们非常气愤,发起了反对棉布税和《英爱商约》的游说活动。<sup>⑩</sup>

2月,代表英国冶铁业和金属加工业利益的伯明翰商会(Birmingham Commercial Committee)<sup>①</sup>也闻风而动,开会商量对策。不久又召集伯明翰和周边地区的工商业企业家开会,通过了反对《英爱商约》的决议,并向英国议会发起请愿,要求爱尔兰仿效英国模式改革税收体制,提高税率,特别要求爱尔兰进口“棒铁”(bar iron)等原材料的关税税率应当提高到英国的水平。<sup>②</sup>乔塞亚·韦奇伍德担任主席的英国陶器制造商协会(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of Earthenware)在1785年2月的会议上,决定派遣代表出席英国枢密院就《英爱商约》举行的听证会。<sup>③</sup>

共同立场促使英国各行业的企业家们实现大联合。代表陶瓷业的乔赛亚·韦奇伍德、代表伯明翰金属加工业和梅德兰地区钢铁业利益的塞缪尔·加伯特和马修·博尔顿、代表海外贸易商人利益的布里斯托尔商人威廉·吉本斯等人共同发出倡议:组织“一个由英格兰和苏格兰所有工业中心派代表参加的委员会,并且在讨论爱尔兰条约期间,会址设在伦敦”。<sup>④</sup>这个倡议很快获得了各地企业家的赞成。

1785年3月14日,大不列颠制造商公会(General Chamber of the Manufacturers of Great Britain,以下简称“制造商公会”)在伦敦成立。这是一个组织严密、资金充裕的全国性组织,其章程规定:第一,制造商公会由个体制造商和各地分会委派的代表(本人必须从事工商业)组成,不隶属任何分会的个体制造商会员应每年缴纳1金几尼<sup>⑤</sup>的会费,各地分会应按每人每年5先令的标准向公会缴纳会费。第二,每年议会开幕后,制造商公会应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由大会任命21名制造商组成执行委员会常驻伦敦,并在每月第一个星期二举行会议;执行委员会应当包括公会的主席、副主席、各地分会的代表,有权通过投票方式就重大问题做出决定。<sup>⑥</sup>除了制造商公会的会员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各行业的企业家还经常举行会议以协调立场和策略。

制造商公会所扮演的角色不再限于单纯的商业协会,还试图成为代表英国制造业利益的政治组织。正如制造商公会的“行动计划”(Plan of The Gen-

eral Chamber of the Manufacturers of Great Britain)所宣称的那样:“以前制造商们一直没有发现这个事实,当土地利益、金融利益、东印度公司和其他商业团体,在这个国家的议会中都拥有自己的支持者、辩护者和利益代表的时候,只有制造业缺席,没有自己的代言人;制造业所遭受的无数苦难大概也正是由这个原因导致的——那些对制造业的真正需求和利益一无所知的大臣们在制定工商业政策时,受到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摆布,虽然无心,但总是损害了这些行业的利益。”<sup>⑦</sup>

制造商公会成立后,立刻投入反对《英爱商约》的斗争中。首先是向英国议会请愿。从1785年3月14日制造商公会成立到5月12日议会表决《英爱商约》之间,大量要求修改英国税收体制和废除《英爱商约》的请愿书被递交给议会下院。其中,3月16日由议员斯坦利提交的请愿书上,有8万名兰开夏郡居民的签名。<sup>⑧</sup>

其次是制造和引导反对《英爱商约》的社会舆论。制造商公会在各种报纸上发表声明反对《英爱商约》和小威廉·皮特的爱尔兰政策,组织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和社会名流撰写反对《英爱商约》的小册子和声明,并向全国散发。其中就有詹姆斯·瓦特起草的《对财政部关于英格兰和爱尔兰钢铁业说明书的解答》(An Answer to the Treasury Paper on the Iron Trade of England and Ireland)。詹姆斯·瓦特指责爱尔兰议会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对本国工业制成品给予出口补贴是在鼓励不正当竞争。他认为,实现英国和爱尔兰的完全合并或者爱尔兰征收与英国同等水平的关税和国内消费税,这样才能体现爱尔兰的“男子汉气概和体面”,才能使英国和爱尔兰的工业企业进行公平竞争。<sup>⑨</sup>

再次是发动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游说政府大臣和有影响力的议员,这是当时进行议会游说最有效的做法。从1760年代开始,参观访问各种新兴工业企业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时髦做法,乔塞亚·韦奇伍德、马修·博尔顿、塞缪尔·加伯特等企业家则热情接待前来参观的达官贵人,与之建立起私人友谊,以换

取政治庇护和支持。1774年,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为延长蒸汽机专利权进行的议会游说活动,展示了他们所能够动用的人脉关系——获得了包括议会105名下院议员和29位上院议员的支持。<sup>③</sup>塞缪尔·加伯特与曾经担任过首相的罗金汉侯爵、谢尔本伯爵等“大人物”私交甚笃。<sup>④</sup>拥有“皇后御用陶匠”(Queen's Potter)头衔的乔塞亚·韦奇伍德则与格雷伯爵、贝德福德公爵等上流显贵交往密切。为了游说反对《英爱商约》,乔塞亚·韦奇伍德拜访并获得了议会反对党领袖福克斯、谢里登勋爵、威廉·艾登等人的支持,同时他拜访了执政的小威廉·皮特首相、爱尔兰总督波特兰公爵等人,阐明制造商公会反对《英爱商约》的理由。<sup>⑤</sup>

最后是动员各议会选区直接对议员施加压力。制造商公会发动各地分会向本地选区的议员施压,要求这些议员公开声明反对《英爱商约》。例如,1785年3月,乔塞亚·韦奇伍德担任主席的英国陶器制造商协会,决定向代表斯塔福德郡的两位下院议员发出备忘录,申明协会的立场,建议两位议员投票反对。<sup>⑥</sup>

制造商公会的游说活动给英国政府造成了巨大压力,虽然小威廉·皮特首相在议会辩论中对制造商公会嗤之以鼻,却不得不采纳制造商公会的部分意见对《英爱商约》做出修改,如禁止爱尔兰直接同南非、南美进行贸易,爱尔兰进口印度货物必须经由英国转口;英国议会有权限制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等殖民地由爱尔兰进口货物,有权管理爱尔兰和美国的贸易;爱尔兰遵守英国管理殖民地航运和贸易的全部法律等。<sup>⑦</sup>但制造商公会对于修订后的《英爱商约》仍然不满意,组织发动新一轮的请愿活动。虽然小威廉·皮特首相操纵议会通过了《英爱商约》,但民族情绪高涨的爱尔兰议会认为自己的独立立法权遭到限制,投票拒绝接受修订后的《英爱商约》。1786年1月24日,国王乔治三世在议会开幕演说中宣布同爱尔兰的谈判失败,《英爱商约》无疾而终。

在《英爱商约》引发的这场争论中,英国企业家群体坚决反对给予爱尔兰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应

该是刻意忽略了当时尚在世的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意见,因为亚当·斯密早在1779年就明确表态支持给予爱尔兰自由贸易的权利。1779年10月12日,爱尔兰议会一致通过实行自由贸易的决议,时任英国商务大臣威廉·艾登就此问题咨询苏格兰贵族、议员亨利·邓达斯。邓达斯于10月30日致信亚当·斯密求教。亚当·斯密在11月1日回复亨利·邓达斯和11月8日致卡莱尔勋爵的两封信中,比较系统地阐释了支持爱尔兰实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他看来,爱尔兰议会所要求的“自由贸易”是“有自由从不论什么地方购买最便宜的他们需要的所有货物……爱尔兰人的要求也许就是这个最公正和合理的出口与进口自由”<sup>⑧</sup>。同时,他也主张允许爱尔兰的农产品和工业品自由输入大不列颠。

首先,亚当·斯密认为,爱尔兰缺乏发展制造业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不会对英国形成威胁。他在给邓达斯的信中指出:“即使容许爱尔兰实行自由贸易,我不相信,在今后一个世纪中,大不列颠的制造业将受爱尔兰制造业的竞争而遭受很大挫折。”<sup>⑨</sup>其次,亚当·斯密从大英帝国的整体利益出发,指出爱尔兰的繁荣发展能够增加大英帝国的财富和力量,如果将爱尔兰与不列颠对立起来,仅为了维护不列颠部分制造业城市的利益而扼杀爱尔兰的经济发展潜力,是非常不明智的。他在给邓达斯的信中指出:“把帝国如此巨大美好地区的工业置于死地,为的是保护苏格兰或英格兰某几个城市的垄断地位,是既不公正又不妥当的。爱尔兰的普遍富裕和进步在恰当的安排下肯定会为政府提供更多的财源,要比从少数几个商业或工业城市获得的多得多。”<sup>⑩</sup>在致卡莱尔勋爵的信中,他指出如果爱尔兰的工业发展达到与英格兰并驾齐驱的状态,会对整个大英帝国有好处,也有利于英格兰的发展,“正如爱尔兰开夏的财富与工业对约克郡的财富与工业不起阻碍作用而起推动作用一般,爱尔兰的财富与工业不会阻碍英格兰财富与工业的发展,而会推动它们的进步”<sup>⑪</sup>。

遗憾的是,亚当·斯密支持爱尔兰发展自由贸易

的睿智分析并未获得英国企业家群体的赞同。处于工业化启动阶段的英国各行业门类还没有确立工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必须依靠重商主义的关税保护,才能保证对英国国内市场和殖民地市场的占有。例如,前文提到,1785年2月伯明翰商会请愿要求爱尔兰进口棒铁的关税应当提高到英国的水平。对此,小威廉·皮特政府提出了把英国进口棒铁的关税降至爱尔兰关税水平的建议,却遭到英国制铁业企业家的集体反对,他们坚持要求提高爱尔兰关税,而不是降低英国关税,其理由是:“将英国对进口铁的关税税率降至同爱尔兰一样的水平,不仅使关税税收立刻大减,且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即此举还能毁灭英国的制铁业,从而对国家的整体税收和安全产生影响。由此,我们建议爱尔兰应把其对进口外国铁的关税税率提高到同我国一致的水平,这是使两国的钢铁业处于同等竞争平台的最实在、最便捷的方法。”<sup>⑧</sup>

1801年,爱尔兰作为大英帝国的特殊成员和英国事实上的殖民地,与英国和其他殖民地之间在人员、资本、技术、货物的自由流通方面享有诸多便利,《英爱商约》会强化这种便利。同时,爱尔兰较低的工资成本和丰沛的水力资源,让当时主要依靠水力的英国各行业企业家担忧爱尔兰工业发展的潜力和竞争前景。缺乏“自信”的英国企业家们对任何可能威胁其行业利益的政策保持高度警惕,抱着绝不能“养虎为患”的心态扼杀爱尔兰的工业化萌芽。

## 二、企业家群体支持 1786 年《英法商约》

19世纪中期的英国政客帕默斯顿曾说过:“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值得我们追随。”<sup>⑨</sup>这句名言非常传神地概括了英国外交奉行的实用主义价值观。英国新兴企业家群体也是奉行实用主义、追逐实际利益的精明生意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1785年强烈反对《英爱商约》的那些人到1786年却摇身一变成为《英法商约》的坚定支持者。

1783年,英国和美国签订了结束北美独立战争的《巴黎条约》,英、法两国同时签署了《凡尔赛条

约》,约定就建设互惠型的自由贸易关系进行谈判,以促进贸易发展。1786年,英、法两国正式开始谈判。<sup>⑩</sup>与《英爱商约》谈判过程中忽视英国工业利益诉求的态度不同,小威廉·皮特首相在《英法商约》谈判过程中非常注意维护英国棉纺织业、钢铁业的利益,注意征求英国工业企业家群体的建议。如在1786年2月12日的议会辩论中,小威廉·皮特首相表示,英国制造商非常值得尊敬和关照;签订《英法商约》的目标是鼓励工业发展,扩大纺织、金属、陶瓷等英国商品的出口;政府在谈判中对涉及制造业利益的问题会充分听取行业代表们的意见。<sup>⑪</sup>小威廉·皮特首相委派与英国企业家关系密切的辉格党领导人威廉·艾登为谈判代表,并指示艾登要与英国企业家们保持直接联系,广泛听取其意见与诉求。<sup>⑫</sup>同时指出,英国绝不接受法国对进口大宗工业制成品如棉纺织品等,征收15%关税的做法。指示艾登在谈判中可以同意大幅降低玻璃制品等部分法国工业产品的进口关税,以换取法国降低英国纺织品的关税,如法国坚持不让步,则可以中止谈判。<sup>⑬</sup>

从1786年3月30日开始,经过近6个月的讨价还价,9月26日英、法双方在互惠互利和保证“航海和商业自由”的基础之上签订了《英法商约》。英国对法国做出的让步包括:英国同意开放进口法国红酒、果醋、白兰地和橄榄油等农产品,关税不高于英国从葡萄牙进口同类产品的税率(英国已给予葡萄牙最惠国待遇);同意开放进口法国生产的细麻布、亚麻布、女帽等高档针织品和玻璃制品;禁止从法国进口丝绸。作为交换,法国同意开放进口英国的钢铁制品、五金制品、陶瓷、棉纺织品、羊毛制品等;对于钢铁制品和棉纺织品,法国同意只征收关税,免征内地税。<sup>⑭</sup>英、法两国确定各类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分别为:金属制品等为10%,棉花、羊毛、细布、麻纱、瓷器、玻璃等不高于12%;对于条约中没有列明的商品,按照最惠国标准征收关税。<sup>⑮</sup>

英国政府在谈判中听取了棉纺织业、陶瓷业和钢铁业等新兴制造业企业家的意见,《英法商约》也基本满足了这些行业的利益诉求,因而受到热烈欢

迎。为反对《英爱商约》而成立的制造商公会,在《英法商约》谈判期间与英国代表威廉·艾登保持密切联系,并提供了大量建议。1786年12月9日,面对反对派的责难,担任制造商公会主席的乔塞亚·韦奇伍德在曼彻斯特主持召开制造商公会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支持《英法商约》的决议,并公开宣布:《英法商约》“按照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为两国开辟了公平贸易的新渠道,将有助于各自国家制造业和商业利益的发展”<sup>47</sup>。

1780年代的英国毕竟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是否开始工业化决定不同行业在与法国的贸易竞争中能否具有比较优势,也决定了不同行业对于自由贸易的态度。例如,当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棉纺织业是支持自由贸易的“急先锋”,在禁止对法国出口纺织机器和英国殖民地棉花的前提下,他们期待通过《英法商约》打开长期封闭的法国纺织品市场。然而,大量受工业化影响较小的传统行业则支持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反对《英法商约》及其体现的自由贸易原则,这导致了制造商公会的分裂和最终解体。在制造商公会内部,集中分布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以地方商业协会身份加入的会员普遍支持《英法商约》,但集中在英格兰南部和伦敦、以个人身份加入的会员则基本反对,后者大部分是尚未开始工业化、受进口法国商品影响较大的传统酿造业、针织业、精纺棉布和精纺呢绒业、墙纸业等行业的从业者。他们对制造商公会执行委员会宣布支持《英法商约》的做法非常不满。

1787年2月初,制造商公会在伦敦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反对派利用人数优势和“主场优势”主导了会议。他们谴责曼彻斯特、斯塔福德和伯明翰的新兴制造业企业家们把持制造商公会的领导权,忽视了大多数成员的利益。经过5天的激烈讨论,会员代表大会决定废除支持《英法商约》的公开决议,改组执行委员会,向政府请愿推迟批准《英法商约》。反对派同时获得了质疑《英法商约》的议会下院议员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支持。柏克在议会辩论中批评制造商公会被斯塔福德郡和兰开夏郡的工商

业利益集团绑架,其通过的决议不能代表英国人民的立场。<sup>48</sup>新兴制造业的企业家们也不甘示弱。1787年3月,斯塔福德郡的陶瓷制造业、兰开夏郡的棉纺织业和代表金属加工业的伯明翰商会联合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制造商公会请愿反对《英法商约》的行为并宣布退出公会。<sup>49</sup>小威廉·皮特首相乐于见到制造商公会的分裂,但他坚定支持《英法商约》,而丧失了新兴制造业企业家群体支持的制造商公会自此分裂,湮没无闻。

《英爱商约》是要让爱尔兰在大英帝国内部享有同英国一样的贸易权利,爱尔兰可以凭借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借助英国的技术、殖民地的原料发展工业,这无疑会让原本垄断了殖民地市场的英国制造业遭遇竞争对手,必然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英法商约》则完全不同,它是英国和法国的双边贸易协定。在《航海条例》和各项禁止技术工人移民外国、禁止机器出口的法令束缚下,法国在技术、原料、市场等方面都无法获得英国工业化发展所拥有的同等条件,这保障了英国新兴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因此,英国棉纺织业和钢铁业的企业家们表示完全不用担心来自法国的竞争,两国的关税越低越好(cannot be too low)。<sup>50</sup>

制造商公会的分裂,标志着新兴制造业与传统制造业在贸易政策上的分歧已经无法弥补,而工业革命则是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正如当时一份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的刊物所观察到的那样:制造业中存在不同的“派别”(factions),一派要求保持对国内市场的控制,另一派(包括棉纺织业、钢铁业、陶瓷业)则希望开放市场,因为“他们所掌握的高超工艺,毫不担忧外来竞争,却希望获得更大的市场需求”<sup>51</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工商界和政界围绕《英法商约》展开的博弈中,著名政治思想家埃德蒙·柏克在英国议会下院多次发言反对《英法商约》。1787年1月26日,小威廉·皮特首相将《英法商约》提交英国议会下院表决,柏克则在1月29日、2月2日的议会辩论中提出推迟表决的要求。2月5日,小威廉·皮

特首相要求确定对《英法商约》进行一读表决的时间,柏克再次发表长篇演说要求推迟表决。

作为英国议会下院的贸易问题专家、亚当·斯密的好友和自由贸易理论的支持者<sup>⑤</sup>,柏克之所以反对《英法商约》,除了他对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等新兴企业家抱有较强烈的个人成见外<sup>⑥</sup>,主要是由于看待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柏克在1787年2月5日的议会辩论发言中指出,《英法商约》12年的有效期内,由于英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法国既没有能力挑战英国的制造业,也需要从英国购买大量制成品,英国仅需要进口法国的农产品和价高量少的奢侈品,这虽然会遏制法国制造业的发展,但能促进法国商业的长期发展。12年后,法国将会拥有更加强大的商业、贸易、海军力量,会对英国产生毁灭性影响。<sup>⑦</sup>此外,柏克从英国外交战略出发,指出《英法商约》意味着英国与法国结成贸易同盟,会削弱英国发挥大陆均势离岸平衡手的作用,严重损害英国的政治利益和外交利益。在关于《英法商约》的最后一次议会辩论中,柏克再次强调商约虽然能给英国带来短期的经济利益,但会使英国处于战略上的不利地位。<sup>⑧</sup>

柏克并未能阻止英国议会批准《英法商约》,因为他所要对抗的不仅包括小威廉·皮特首相领导的政府,还包括大力支持《英法商约》的英国新兴制造业企业家群体。英国工业化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崭露头角的新兴制造业企业家群体已经通过联合行动,在事关切身利益的内外外交问题上影响英国政府的决策,成为一股难以忽视的政治力量。

### 三、企业家群体主导反《谷物法》运动

1815年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标志着英国打败了最后一个有能力挑战其世界殖民霸权的欧洲强国,实现了“扩张在东方的贸易和夺取世界各地战略据点的目标”<sup>⑨</sup>,确立了傲视欧洲群雄、独霸世界海洋的殖民霸权。英国历史学家认为,“滑铁卢战役之后的大不列颠,至少在一个世代里达到了顶峰,影响巨大,实现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sup>⑩</sup>。世界殖民霸权同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经济实力结合

在一起,让愈来愈多的英国企业家认识到,只有开放自由贸易才能确保英国长期支配世界经济,自由贸易是最便宜、最有利的政策。<sup>⑪</sup>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棉纺织业、钢铁业等新兴工业部门发展迅速。虽然1806年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让英国的工业品暂时失去了欧洲市场,却促进了英国对亚非市场的开拓,因而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并保持工业发展和外贸出口的较快增长。如果确定1805年英国的出口指数为100,受大陆封锁影响只有1808年的指数下降到91,1809年上升到125,1810年上升为126,其中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额从1805年的860万英镑增加到1808年的1250万英镑,1809年继续增长到1440万英镑。<sup>⑫</sup>战争带来的军需订货刺激了英国钢铁业的快速发展,1788—1810年间英国生铁产量增长了3倍,炼铁高炉数量从1788年的85座增加到1806年的221座。英国外贸增长促进了海运业发展,1788—1815年间英国商船吨位增长了1倍。<sup>⑬</sup>

从微观上看,曼彻斯特的棉纱精纺工厂“麦康内尔和肯尼迪合伙企业”(以下简称“麦肯企业”)在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也颇具代表性,展示了英国新兴制造业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发展状况。麦肯企业创办于1795年,初始资本只有1769英镑,仅仅5年后的1800年就暴增为21838英镑,增长了1233%。1810年资本总额达到88375英镑,较1800年增长了404%。<sup>⑭</sup>1802—1818年间,企业的雇工数量从312人上升到1125人,骡机数量从80台上升到269台,纺纱机锭数量从21840个增加到79020个。<sup>⑮</sup>正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麦肯企业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英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棉纱精纺厂。

然而,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对英国农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无法从欧洲大量进口粮食和本国农业歉收,英国粮价暴涨,从原本的每夸脱<sup>⑯</sup>66先令飞涨至1810年的117先令,1812年竟高达155先令。谷物生产的高额利润诱导土地贵族大量投资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1815年后,欧洲大陆粮食

涌入英国,造成谷物价格暴跌。1816年1月小麦价格只有每夸脱52先令6便士<sup>⑥</sup>,战时形成的农业畸形繁荣难以维持。谷物价格暴跌强烈触动了以贵族地主为核心的农业利益集团的神经,由此导致的农业衰退和社会动荡也让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感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地主利益和社会稳定成为英国政府的主要目标,1815年《谷物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制定出来的。<sup>⑥</sup>

从维护粮食安全、保证英国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看,1815年《谷物法》无可厚非,但英国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谷物供应过量。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大陆谷物的进口仅造成了特定时期的谷物相对充裕,由于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扩大了对粮食的消费需求,绝对的匮乏才是英国粮食需求的长期趋势。为此,保证国际谷物的自由贸易,使国内谷物价格维持在相对较低的价位上,符合大部分谷物消费者和英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

1815年《谷物法》是为了维护贵族地主利益而牺牲广大民众利益的阶级立法,势必遭到普遍反对。对英国工业企业而言,人为抬高的粮食价格推高了工资水平,压缩了企业经营利润,居高不下的粮食价格还提高了纺织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因为它们在纺纱、织布、漂白等工序需要大量使用小麦面粉。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工商界期盼已久的欧洲市场并未向英国商品打开大门。英国的《谷物法》给欧陆各国提供了坚持重商主义政策的借口。除德意志各邦国以外的法国、奥地利、沙俄等国,对英国工业制成品的倾销保持高度警惕。对英国大部分门类的工业产品,要么禁止进口,要么征收高额关税,严重限制了英国商品在欧洲大陆的销售。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于1834年成立后,立刻提高进口纺织品的关税,加剧了当时英国纺织业的出口危机。1836年,普鲁士政府回复英国贸易部举行双边贸易谈判的提议时指出,只要英国同意降低谷物、木材的进口关税,德意志关税同盟愿意降低纺织品的进口关税。<sup>⑥</sup>

对此,英国议会议员、马克思笔下的“英国自由

贸易的代言人”<sup>⑥</sup>——约翰·包令(John Bowring)在1839年致信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提醒关注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新动向:德意志制造业利益已“大为增强,除非利用关税逐步下降的手段以一套让步措施来加以抵制,不然它将逐年不断增强”。1840年,约翰·包令又在议会发言说:“由于我们恶劣的立法《谷物法》,我们自己已经制造了不必要的竞争对手。许多此类国家本来决不会梦想成为工业制造者的。”<sup>⑥</sup>因此,废除《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不但能够获得广阔的欧洲市场,还能延缓欧洲大陆制造业的发展,维持英国在工业上的垄断优势。

《谷物法》遭到了英国工商界企业家、以哲学家边沁为领袖的英国议会“哲学激进派”(philosophical radicals)议员群体以及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反对。1820年,伦敦商会向议会提交了由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起草的请愿书,要求“废除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对外贸易”<sup>⑥</sup>。此次请愿得到了曼彻斯特、约克郡西区、爱丁堡、格拉斯哥等工业化地区商会的响应,各地请愿书如雪花一般涌向英国议会,这标志着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整体转向支持自由贸易。

1836年,“哲学激进派”议员群体与伦敦的出版界人士、社会活动家发起成立了“伦敦反谷物法协会”,在议会提出废除《谷物法》的议案,制造了反《谷物法》的社会舆论和政治压力。<sup>⑥</sup>受农业歉收和外贸萧条的影响,1838年9月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企业家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得到其他30多个工业城市或地区的积极响应。<sup>⑥</sup>1839年3月各地“反谷物法协会”的代表齐聚伦敦,声援议员查尔斯·维尔利尔斯(Charles Pelham Villiers)向英国议会下院提出的废除《谷物法》动议,并在该动议被否决后的3月20日宣布成立“全国反谷物法同盟”(The Anti-Corn Law League,以下简称“反《谷物法》同盟”)。<sup>⑥</sup>在工业革命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新兴企业家群体掌握了反《谷物法》运动的领导权。

无论从目标、所依赖的社会力量,还是领导者的构成来看,反《谷物法》同盟都是代表和维护工商业

利益的一个组织。反《谷物法》同盟发端于英国兰开夏郡,以曼彻斯特为总部,以工厂主企业家居主导地位,这些因素都意味着工业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财富、新势力结合在一起,力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改变和塑造国家的公共政策。反《谷物法》同盟也正是凭借自身所代表的社会经济力量,能够调动、支配的财力,高效的组织宣传能力和巧妙的行动策略,推动反《谷物法》运动的蓬勃兴起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国内学术界对反谷物法同盟的活动及影响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全面,在此不再赘述。<sup>③</sup>

### 结语

有中国学者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习惯于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归因为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是在塑造“自由贸易的神话”,不但缺乏立论依据,本质上也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经济学和历史观,对后发赶超型现代化国家的学术界和决策者产生了不良影响。<sup>④</sup>

英国虽然是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的发源地,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新兴工业企业家群体不是自由贸易的“天然”拥护者。作为精明的生意人,他们总是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支持或反对某一种贸易政策,而不是被某种更动听的理论所“感动”。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强调贸易保护的重商主义能够确保新兴工业企业垄断国内和殖民地市场,自然受到企业家们的欢迎,自由贸易理论在他们中间没有多少市场。1796年亚当·斯密修订《国富论》第8版时,要特意加上一段话,谴责英国制造业和商业中的“违反人类常识”的“垄断意识”,哀叹要在英国实现自由贸易,无异于“建造大洋国或乌托邦”一样困难。<sup>⑤</sup>

按照自由贸易理论,1785年《英爱商约》和1786年《英法商约》都能有效推动双边自由贸易,理应受到英国制造业和商业的欢迎。亚当·斯密坚定支持上述两个商约,并对英国制造商公会提出的反对理由加以驳斥。<sup>⑥</sup>小威廉·皮特首相从大英帝国治理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英爱商约》缓和英爱矛盾,促进爱尔兰工商业发展。但以制造商公会为代表的英国

制造业企业家群体担心爱尔兰成长为强劲的工业竞争对手,更担心丧失对殖民地市场的垄断地位,因此极力反对。由于《英爱商约》允许爱尔兰按照英国同样的条件进口殖民地棉花,并允许英国的棉纺织机器输出到爱尔兰,从而为爱尔兰创造发展棉纺织业的机会。这引发了英国新兴棉纺织业企业家的警觉。他们认为,爱尔兰的水力资源更为丰沛(蒸汽动力尚不成熟,工厂机器靠水力推动)、劳动力成本更廉价、企业纳税负担更轻(据威廉·艾登估计,英格兰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是爱尔兰纳税人的6倍)以及小威廉·皮特首相增加英国棉布国产税的法案,都会使英国棉纺织业受到毁灭性影响。1785年4月11日,曼彻斯特的18位主要棉纺织业企业家(他们雇佣的工人数量超过42000人)召开会议,认为《英爱商约》将毁灭曼彻斯特纺织业,决定派遣代表团赴爱尔兰考察投资开办棉纺织工厂的可行性。<sup>⑦</sup>即使在政治上拥护小威廉·皮特首相的棉纺织业企业家老罗伯特·皮尔<sup>⑧</sup>,也在议会批评《英爱商约》和棉布国产税将毁灭英格兰的棉纺织业。

在反对《英爱商约》的过程中,制造商公会坚持对进口钢铁征收高额关税的做法,最能体现英国新兴企业家群体在贸易政策上坚持的实用主义立场。1785年2月代表金属加工业利益的伯明翰商会与其他地区的钢铁业代表(如英国第一家使用焦炭炼铁的科尔布鲁克戴尔钢铁厂老板理查德·雷诺兹)一起向议会请愿,要求将爱尔兰的关税税率提高到英国的水平,特别要提高棒铁的进口关税(当时爱尔兰对棒铁的进口关税是每吨9先令7.5便士,英国是每吨56先令1.5便士)。为此,小威廉·皮特政府提议将英国进口钢铁的关税降低至爱尔兰的水平,但请愿者坚持要求提高爱尔兰的钢铁进口税率而不是降低英国关税,理由是:“将英国对进口铁的税率降至同爱尔兰一样的水平,不仅减少关税收入,还将毁灭英国的制铁业,进而影响国家安全。由此,我们建议爱尔兰把进口外国铁的关税税率提高到我国的水平,这是使两国的钢铁业进行公平竞争最实在、最便捷的方法。”<sup>⑨</sup>

由于当时英国的炼钢技术还没有实现大的突破,在生产规模和成本上与瑞典、俄罗斯相比,还不具备优势,只能依靠高额关税限制外国棒铁的进口,以保证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因此他们极力反对降低棒铁的进口关税。同样,如果英国和爱尔兰互相开放市场,爱尔兰钢铁业依靠低廉的人力成本和较低的进口关税,将成为英国钢铁业在国内市场和殖民地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对手,这是英国钢铁业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制造商公会反对给予爱尔兰自由贸易的权利,除了英国对爱尔兰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殖民压迫所形成的深层次心理因素外,从现实经济利益的角度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工商业已经占有了作为殖民地的爱尔兰市场,他们不愿意失去这样一个庞大市场,更不愿意看到在这个市场里成长出自己的竞争对手。信奉实用主义的英国“小店主们”不会为了“自由贸易”的噱头而放弃到手的经济利益。

但是,为了开拓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市场,英国制造商公会是非常乐意在自己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中追求“自由贸易”权利的。因此,在1785年坚决反对《英爱商约》的英国新兴企业家们,到1786年反而热烈拥抱自由贸易,积极支持小威廉·皮特首相签订《英法商约》,并不惜同制造商公会里代表传统工业利益的同行们分道扬镳。这也说明了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英国制造业中新旧行业的利益冲突:英国棉纺织业、钢铁业、陶瓷业等最先开始工业化的行业与法国同行相比,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他们渴望获得开放的法国市场,愿意拥抱自由贸易。

经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的工业化发展逐渐成熟,新兴制造业企业家群体的力量不断壮大,影响国家政策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如果说1785年制造商公会只能抱怨制造业在议会中缺乏政治利益代言人,制定工商业政策的大臣们对制造业的真正需求和利益一无所知,<sup>①</sup>那么到1840年代,新兴企业家群体的代表如理查德·科贝登、约翰·布莱特等人已经进入议会并主导了废除《谷物法》的辩论。企业家们发起领导的反《谷物法》同盟也不再仅仅限于谦恭地进行请愿、劝说活动,而是像政党一样

操纵地方选民登记、补缺选举等活动,对轮流执政的辉格党和保守党形成了强大政治压力。因此,当代表了农业集团利益、受到掌握政权的贵族地主阶级支持的《谷物法》一旦被废除,也就意味着“炸毁了地主阶级保守势力赖以抵御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最后一道屏障”<sup>②</sup>，“是自由贸易在19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sup>③</sup>，它宣告了重商主义时代的结束、自由贸易时代的来临。

当然,英国企业家群体推动废除《谷物法》、实现自由贸易,完全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实用主义目的。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英国工业化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制造业初步实现了机械化,技术水平、工业生产能力“一骑绝尘”,获得了超越其他所有国家的总体比较优势。就英国工商业而言,对工业制成品的保护贸易没有价值,以“自由贸易”的名义占领广阔的世界市场则成为英国企业家群体追求的目标。在法国、俄罗斯等欧洲大国拒绝开放市场、拒绝谈判双边自由贸易条约的情况下,英国企业家群体和英国政府只能采取单方面改革税制,并在同样条件下对所有国家开放市场的自由贸易政策,希望能够引导其他国家走向自由贸易,从而为具备比较优势的英国工业产品打开广袤的市场。

#### 注释:

①唐晋:《大国崛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

②西方学术界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两巨擘——法国学者芒图 and 英国学者阿什顿都支持这种观点。芒图指出:“近代大工业是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三十余年中在英国产生的。”参见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页。阿什顿的专著《英国工业革命:1760-1830》则直接标明了他限定的工业革命时段,参见T. S. Asht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③王觉非:《近代英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62页。

④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54页。

⑤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

⑥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43-344页。

⑦Harold Perkin,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914*, second edition,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6; Asa Briggs, *The Age of Improvement 1783-1867*, London: Longman, 1979.

⑧C. P. Kindleberger,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n Western Europe 1820-187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No. 1, March, 1975, pp. 20-55.

⑨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

⑩辜燮高:《现代英国刊物中对废除谷物法意义的研究》,载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编:《英国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27-151页。

⑪蒋孟引:《英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07-408页。

⑫P. S. Fitton, A. P. Wadsworth, *The Strutts and the Arkwrights 1758-1830: A Study of the Early Factory Syste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70.

⑬自17世纪中叶克伦威尔全面征服爱尔兰后,英国政府严格限制爱尔兰工商业发展,力图把爱尔兰变成英格兰的工农业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例如,规定爱尔兰不能发展羊毛纺织业,出产的羊毛只能卖给英格兰商人;《航海条例》规定爱尔兰的进出口贸易必须由英国船只承运,必须经由英国人之手进行。参见 Peter R. Newman, *Companion to Irish History: From the Submission of Tyrone to Partition 1603-1921*, London: Facts on File, 1991, p. 131。

⑭T. S. Ashton, *Iron and Stee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67.

⑮Edmund Curtis, *A History of Ireland*,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7, p. 315。在1801年与爱尔兰合并之前,英国的正式国号是“大不列颠王国”(Kingdom of Great Britain),爱尔兰的国号是“爱尔兰王国”(Kingdom of Ireland),与英国拥戴共同的君主,组成“共主邦联”。1801年,两个王国合并后正式更改国号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⑯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是第一任查塔姆伯爵、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之子,从1783年12月到1801年、1804年到1806年1月担任首相,对英国的贸易政策进行了较大改革。

⑰Edmund Curtis, *A History of Ireland*,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7, pp. 326-327.

⑱Witt Bowden, "The Influence of the Manufacturers on Some of the Early Policies of William Pit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9, No. 4, July, 1924, p. 659.

⑲小威廉·皮特担任英国首相后,为了弥补巨额军费亏空,平衡预算,将英国蓬勃发展的新兴工业当成“下金蛋的鹅”,对各种工业原材料和制成品开征新税或提高税率。从1784年开始,英国政府相继开征“砖块税”“煤炭税”(每吨煤征收2先令)“粗棉布税”“白棉布税”(税率为每码4-5便士,另加15%的附加税,并要求棉纺织业的漂白和染色两个工序购买特许证),引发了各行业的激烈抗议。

⑳Witt Bowden, *Rise of the Great Manufacturers in England 1760-179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esis, Allentown: H. Ray Haas & Co., 1919, p. 66.

㉑伯明翰商会成立于1783年7月,其领导者是五金加工业的英国企业家塞缪尔·加伯特(Samuel Garbett)和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lton)。

㉒T. S. Ashton, *Iron and Stee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68.

㉓V. W. Bladen, "The Wedgwood Papers," *Bulletin of the Business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 No. 8, July, 1927, pp. 12-16.

㉔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19页。

㉕英语为Gold guineas,也翻译为“畿尼”,英国传统货币单位,查理二世在位的1663年开始发行,最早使用来自非洲几内亚(黄金海岸)的黄金铸造,重8.4克,价值约等于21先令,略高于英镑(等于20先令)。

㉖Plan of The General Chamber of the Manufacturers of Great Britain, Municipal Reference Library, Birmingham; See T. S. Ashton, *Iron and Stee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70.

㉗T. S. Ashton, *Iron and Stee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69.

㉘Witt Bowden, "The Influence of the Manufacturers on Some of the Early Policies of William Pit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9, No. 4, July, 1924, p. 671.

㉙Samuel Smiles, *Lives of Boulton and Watt: A History of the Inven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Steam-Engine*, London: John Murray, 1865, p. 344.

㉚Eric Robinson, "Matthew Boulton and the Art of Parliame-

nary Lobbying,"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7, No. 2, June, 1964, p. 224.

③ J. M. Norris, "Samuel Garbett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Lobbying in Great Brita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0, No. 3, September, 1958, p. 452.

④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19页。

⑤ V. W. Bladen, "The Wedgwood Papers," *Bulletin of the Business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 No. 8, July, 1927, pp. 12-16.

⑥ Edmund Curtis, *A History of Ireland*,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7, pp. 326-327.

⑦ 欧内斯特·莫斯纳、伊恩·辛普森·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等译、吴良健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35页。

⑧ 欧内斯特·莫斯纳、伊恩·辛普森·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等译、吴良健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32页。

⑨ 欧内斯特·莫斯纳、伊恩·辛普森·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等译、吴良健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32页。

⑩ 欧内斯特·莫斯纳、伊恩·辛普森·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等译、吴良健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36页。

⑪ T. S. Ashton, *Iron and Stee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68.

⑫ "Treaty of Adrianople—Charges Against Viscount Palmerston, House of Commons Debate," March 1st, 1848, Vol. 97, cc122, [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848/mar/01/treaty-of-adrianople-charges-against#S3V0097P0\\_18480301\\_HOC\\_8](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848/mar/01/treaty-of-adrianople-charges-against#S3V0097P0_18480301_HOC_8), 2021年2月20日。

⑬ Orville T. Murphy, "Dupont de Nemours and the Anglo-French Commercial Treaty of 1786,"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9, No. 3, September, 1966, p. 577.

⑭ Witt Bowden, "The English Manufacturers and the Commercial Treaty of 1786 with Franc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5, No. 1, October, 1919, p. 29.

⑮ J. M. Norris, "Samuel Garbett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Lobbying in Great Brita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0, No. 3, September, 1958, p. 459.

⑯ Witt Bowden, "The English Manufacturers and the Commercial Treaty of 1786 with Franc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5, No. 1, October, 1919, p. 29.

⑰ Witt Bowden, *Rise of the Great Manufacturers in England 1760-179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esis, Allentown: H. Ray Haas & Co., 1919, p. 76.

⑱ 康波:《18世纪的英法贸易竞争与1786年英法协定——重商主义的演进与嬗变》,《学术交流》2009年第8期。

⑲ *Gazetteer and New Daily Advertiser*, December 12, 1786; *Gazetteer and New Daily Advertiser*, February 12, 1787; *Gazetteer and New Daily Advertiser*, February 17, 1787; *Gazetteer and New Daily Advertiser*, February 21, 1787; See Witt Bowden, "The English Manufacturers and the Commercial Treaty of 1786 with Franc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5, No. 1, October, 1919, p. 20.

⑳ J. M. Norris, "Samuel Garbett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Lobbying in Great Brita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0, No. 3, September, 1958, p. 459.

㉑ Witt Bowden, "The English Manufacturers and the Commercial Treaty of 1786 with Franc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5, No. 1, October, 1919, p. 21.

㉒ Witt Bowden, "The English Manufacturers and the Commercial Treaty of 1786 with Franc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5, No. 1, October, 1919, p. 29.

㉓ Witt Bowden, "The English Manufacturers and the Commercial Treaty of 1786 with Franc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5, No. 1, October, 1919, p. 24.

㉔ 亚当·斯密曾说过柏克的经济思想与他完全一致。关于两人的交往和自由贸易理论,参见 Donald Winch, "The Burke-Smith Problem and Late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8, No. 1, March, 1985, p. 231.

㉕ 埃德蒙·柏克与马修·博尔顿、詹姆斯·瓦特在诸如延长瓦特蒸汽机专利权、放松对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进出口贸易的管制等问题上的对立和斗争,参见 Eric Robinson, "Mathew Boulton and the Art of Parliamentary Lobbying,"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7, No. 2, June, 1964, pp. 210-213.

㉖ Edmund Burke, "Speech on French Commercial Treaty, 21 February 1787," in P. J. Marshall, Donald Bryant, Paul Langford, eds.,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37.

㉗ Edmund Burke, "Speech on French Commercial Treaty, 21 February 1787," in P. J. Marshall, Donald Bryant, Paul

Langford, eds.,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35.

⑤ W. D. Husse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44.

⑥ K. B. Smellie, *Great Britain since 1688: Modern Histor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p. 187.

⑦ 张本英:《自由帝国的建立:1815-1870年英帝国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⑧ 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下,河北师大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13-114页。

⑨ 塔塔里诺娃:《英国史纲:1640年—1815年》,何清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353-354页。

⑩ C. H. Lee, *A Cotton Enterprise, 1795-1840: A History of M'Connel and Kennedy, Fine Cotton Spinner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01-102.

⑪ C. H. Lee, *A Cotton Enterprise, 1795-1840: A History of M'Connel and Kennedy, Fine Cotton Spinner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62.

⑫ 夸脱(Quarter)是英国的容积单位,1夸脱小麦的重量约为250千克。

⑬ 王觉非:《近代英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9页。

⑭ A. E. Bland, P. A. Broun and R. H. Tawney, eds.,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Select Documents*, Rochdale: Bell and Sons, Ltd., 1914, pp. 697-698.

⑮ 张云宜:《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的自由贸易运动》,《史学月刊》1984年第4期。

⑯ See David Todd, "John Bowring and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Free Trade,"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51, Iss. 2, June, 2008, p. 386.

⑰ Philip Bowring, *Free Trade's First Missionary: Sir John Bowring in Europe and Asi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70.

⑱ A. E. Bland, P. A. Broun and R. H. Tawney, eds.,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Select Documents*, Rochdale: Bell and Sons, Ltd., 1914, pp. 689-690.

⑲ Michael J. Turner, "The 'Bonaparte of Free Trade' and the Anti-Corn Law League,"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41, No. 4, Dec. 1998, pp. 1011-1034.

⑳ Anthony Howe, *The Cotton Masters 1830-1860*, Oxford

an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984, p. 210.

㉑ Henry Donaldson Jordan, "The Political Methods of the Anti-Corn Law Leagu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42, No. 1, Mar. 1927, pp. 58-76.

㉒ 笔者有专文论述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废除谷物法和实现自由贸易转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参见尹建龙、陈雅珺:《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企业家群体与自由贸易转向——以“反谷物法同盟”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其他相关成果有张云宜:《试析英国反谷物法同盟》,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8-188页;胡华军:《反谷物法同盟压力活动之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1年;唐山:《理查德·科布登与英国谷物法的废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㉓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工业化考辨》,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页。

㉔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2页。

㉕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工业化考辨》,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52页。

㉖ Witt Bowden, "The Influence of the Manufacturers on Some of the Early Policies of William Pit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9, No. 4, July, 1924, pp. 668-670.

㉗ 老罗伯特·皮尔是棉纺织业的第一代工厂主,也是主持废除《谷物法》的小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首相的父亲。1802年老罗伯特·皮尔的企业雇用了1.5万名工人,上缴国产税达4万英镑。老罗伯特·皮尔在政治上支持小威廉·皮特首相,视其为工业的开明赞助人。老罗伯特·皮尔1797年捐款1万英镑给小威廉·皮特政府;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出钱装备了8个连的民兵,自己兼任民兵团长。1790年成为英国议会下院议员,1830年去世。1834年小罗伯特·皮尔第一次出任英国首相。参见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24页。

㉘ T. S. Ashton, *Iron and Stee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68.

㉙ T. S. Ashton, *Iron and Stee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69.

㉚ 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14页。

㉛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5页。